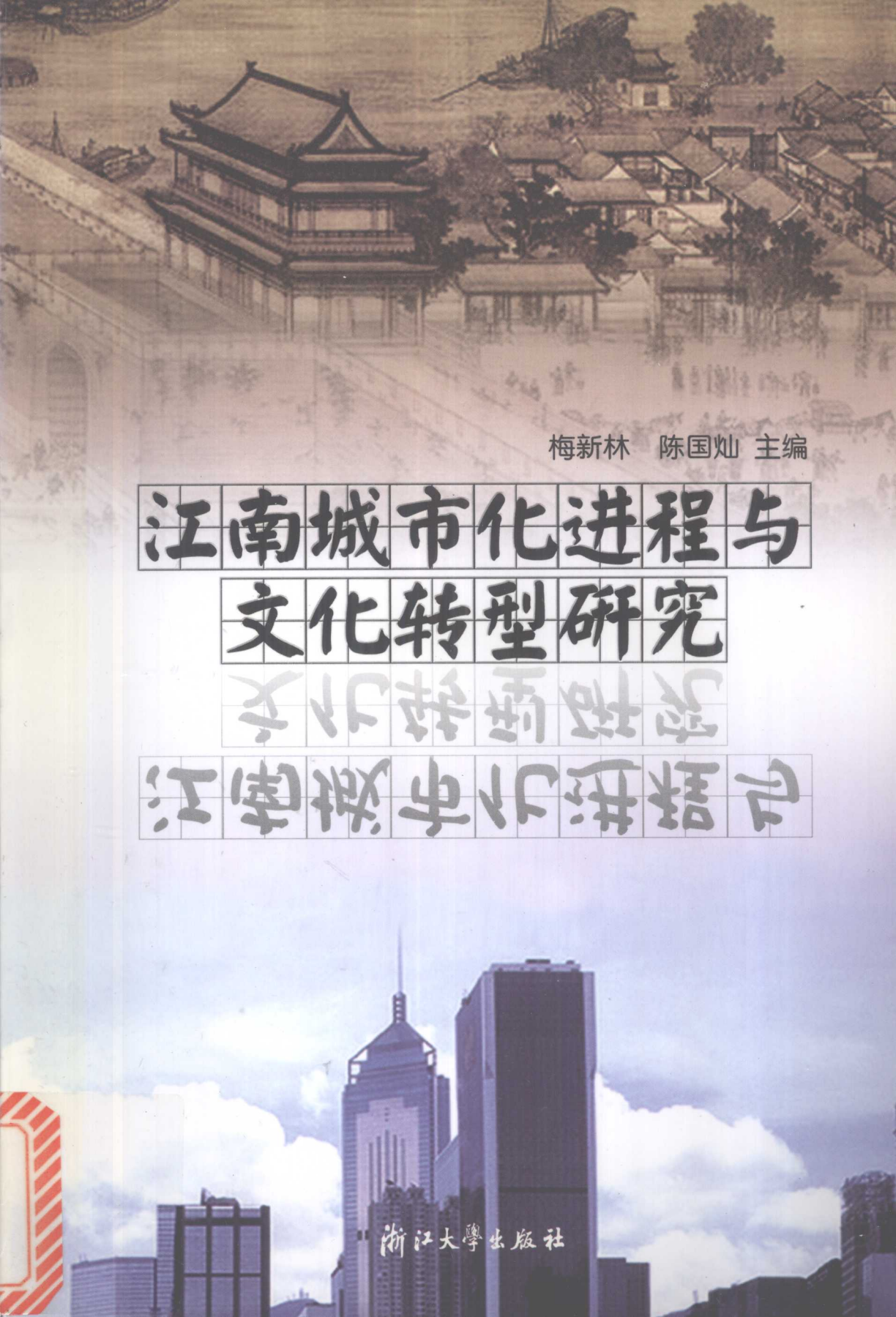




梅新林 陈国灿 主编

江南城市化进程与

文化转型研究

文化转型研究

江南城市化进程与

浙江大學出版社

江南城市化进程 与文化转型研究

梅新林 陈国灿 主编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 / 梅新林, 陈国灿主
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7
ISBN 7-308-04318-5

I. 江... II. ①梅... ②陈... III. 城市化—研究—
华东地区 IV. F299.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5166 号

责任编辑 徐素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68 千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318-5/F·579

定 价 30.00 元

主 编 梅新林 陈国灿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陈华文 张先亮 邵海燕 郑祥福

周瑞法 钟依均 俞樟华 徐 勇

策 划 丛荪林 勇汉荣 倪建海 朱旭峰

前言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历来是我国社会发展较快和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区域,许多方面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更是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开始全面走上具有现代特征的城市化道路。

从本质上讲,城市化是一种社会变革。它不仅表现为城市和城镇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更是基于生产力发展而引发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跃升,其中既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市的集中、转型、强化、分化,以及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与空间扩散,也包括以城市体系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变革,还包括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发展并逐渐成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体。因此,推动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重视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的彼此协调和互相促进。特别是在当前城市化建设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形势下,如何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实现文化的全面转型与持续繁荣,形成社会的良性发展,走上具有区域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我们于2003年7月召开了“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引起更多的学者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推动相关问题讨论的展开和进一步深入;同时也是借此机会汇集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参加这次学术会议的学者,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其中既有著名的老专家,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涉及城市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文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所讨论的内容,既有对历史的总结与反思,也有对现状的分析和设想;既有对江南地区的宏观考察,也有以不同地区为对象的具体研究;既有对城市和城镇发展形态的分析,也有对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文化等领域发展、演变的专题讨论。可以说,本次会议主题鲜明,内容广泛,角度多样,观点纷呈,反映出与会者不同的认识和思考。这些认识和思考显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江南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准确把握城市化的区域格局与特点,科学处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和转型的各种关系,积极探索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

道路。本书就是选择部分会议论文编辑而成的。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会议由浙江省人事厅主办,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承办。从会议的筹备、组织、举办,到会后论文的选编、策划和出版等工作,都是在省人事厅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并得到浙江师范大学校领导和人事处、社科处、科技处和校办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对此深表感谢。

城市化与文化发展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能否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现实问题。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推动我国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编者

2005年5月

目 录

关于古代江南城市化的几个问题·····	陈国灿(1)
江南城镇发展历程的返观浅议·····	许怀林(17)
宋代江南城市的发展与堪輿思想的衍变·····	刘学峰 龚维政(27)
南宋浙西地区市镇人口探析·····	吴锡标(35)
略论明清江南城市化·····	陈学文(43)
浅析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与人文内涵·····	张海英(58)
明清城镇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	
——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	杨师群(74)
前近代时期传统市镇的发展状况	
——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	任 放 杜七红(90)
明清以来吴江同里镇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	
——江南乡村城市化个案研究·····	吴仁安(101)
明清江南城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范金民(110)
近代上海与江浙城镇	
——以航运网络为中心·····	戴鞍钢(117)
近代苏州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以晚清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中心·····	黄鸿山 王卫平(126)
试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王明德(141)
近代宁波港腹地的演变	
——兼及浙江港口腹地格局的形成·····	王列辉(154)
民国时期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	陶水木(169)
近代江南城镇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 ·····	彭南生(183)
20 世纪 30 年代南浔镇的社会状况	
——以 1932 年南浔调查为讨论中心 ·····	钟 华(193)
从“通俗类书”生产看明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商业化·····	刘天振(201)
古代西湖小说的题材特色及美学价值·····	葛永海(212)
神化的江南才女	
——明末清初男性士人心中的理想女性·····	宋清秀(225)

略论清代骈文家的时空分布

- 兼及“环太湖人文生态圈”的文化品格…………… 杨旭辉(234)
- 刘咸炘与浙东史学…………… 粟品孝(244)
- 浙江小城镇分化状况评价体系研究…………… 王正新(255)
- 论城镇精神及其塑造
- 以浙江湖州织里镇为例…………… 陈剑峰(263)
- “城乡一体化”与“三农”新问题…………… 王景新 方湖柳(270)
- 论中国“城”的起源…………… 王瑞成(277)
- 论清代广州书院城市化…………… 王建军 慕容勋(295)
- 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损失初探…………… 袁成毅(309)

关于古代江南城市化的几个问题

陈国灿

近年来,针对江南地区的城市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学术界的讨论相当活跃。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各自的认识和看法,既取得了一系列共识,也存在着不少争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试围绕古代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历史,重点就城市化的理论解释、城市发展与城市化、市镇与农村城市化、城市化的形态演进等问题作一番新的探讨。

一、城市化与早期城市化

对古代江南城市化的讨论,首先涉及到如何从理论上确定城市化的含义与标准问题。正是在此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引发了学术界有关古代江南地区是否存在城市化现象的争论。部分学者按照现代城市化的标准,否认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古代中国已存在城市化现象,认为最多只是出现类似城市化萌芽的若干社会现象。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古代中国不仅存在城市化现象,而且一直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中呈现出与近代以来西方城市化不同的发展道路与特征。^①

众所周知,有关城市化的理论是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兴起而出现的。自1867年西班牙人色丹(A. Serda)率先提出“城市化”(urbanization)这一概念后,很快为人们广泛接受,一度成为工业化的代名词。进入20世纪,随着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和城市形态的变革,城市化的含义也发生很大变化。不少人认为,城市化是以城市为核心和动力的生产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物质形态和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过程,其中包括人口与非农业活动向城市的集中、转型、强化、分异和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等

^① 参见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第145~18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404~4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65~16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

有形过程,也包括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市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和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向乡村渗透等无形过程。城市化是在近代才开始出现,并趋于普及和深化,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潮流。^①显然,这种解释更多的是依据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和社会变革状况提出的,所说的是现代意义的城市化。它没有充分考虑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与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相联系,城市化也是多样性的,不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就是同一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也有着不同的发展形态与特点。

事实上,城市化应该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对城市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相关领域变化的一种表述。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以城市为核心的社会变革现象,城市的产生,便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城市现象的出现,不管这种现象是零散的还是普遍的,是不成熟的还是成熟的,都意味着城市化的起步。如同古代城市虽在形态上很不完整,却不能按照现代城市的标准否认其城市特性一样,我们也不能按照现代标准来判定古代社会不存在城市化现象。从历史学的角度讲,城市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城市发展演变的伴生物。近现代城市是在古代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的城市化也是此前社会长期发展的延续,只是城市化的广度和深度、城市化的发展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城市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虽出现并盛行于近现代,但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现象和进程,则早已存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城市化时,从宏观角度将城市化归纳为依次演进的三种基本形态,即“现代以前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现代模式”和“未来的城市化”。^②其中所说的“现代以前的城市化模式”,就是指古代的城市化。

不过,用“现代以前的城市化”来称呼古代的城市化似过于笼统和宽泛。笔者认为,不妨从方法论角度借鉴部分西方学者用“早期工业化”来称呼工业革命以前欧洲工业发展的理论思维,将古代城市化称为“早期城市化”似

① 参见崔功豪主编:《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江美球:《城市学》,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版;刘歧等:《城市学》,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杜受祜等主编:《中国城市化道路——思考与选择》,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C. S. Yadav: *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City Growth and Change*.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New Delhi, 1986。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第27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更为恰当。^①所谓“早期”，一方面是突出古代城市化与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历史联系，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不少必要的条件，后者是前者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飞跃；另一方面是表明相对于近现代以来“标准化”的城市化而言，古代的城市化是不成熟的，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和特点。这当中，较为明显的是：第一，经济活动的非集聚性。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化，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特别是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工业和服务业活动）向城市的高度集中，以及在城镇体系中的统一分工，使城市在社会经济中具有主导地位。古代的城市化虽也有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的趋向，但主要是市场活动的聚集而非生产活动的聚集，城市更多地充当了经济活动的“调节器”，通过市场活动来影响各地区的生产。事实上，在古代社会，生产活动的重心始终分散在农村地区，城市的发展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第二，社会活动的内聚性。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化，既表现为社会活动向城市的集中，也表现为城市活动的全面扩散，由此形成对社会体系的核心控制。古代的城市化则主要是社会活动向城市的聚集，城市活动的影响力不强，远没有能够达到主导社会活动发展趋向的程度。第三，城乡关系的非对称性。近现代以来的城市化，是城乡之间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这种一体化不是城乡空间界限的完全消失，而是彼此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和文明水平上趋于一致的表现。古代的城市化虽也有城乡之间的互动，但更多的是城市对乡村的控制，而且这种控制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的。

弄清了城市化的理论标准，古代江南是否存在城市化现象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既然从根本上讲城市化是随着城市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的，那么，江南作为古代中国城市的发达区域，不仅存在着城市化现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早期城市化的最高水平。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化在春秋战国和宋代形成两次发展高潮，前者的意义在于众多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后代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后者的意义在于努力冲破古代社会前期城市发展的格局，从人口规模、城市规划、经济结构等方面展现出一种新的城市面貌，从而加速了古代城市化进程。^②说春秋战国时期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城市化高潮似有待商榷，因为此期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形成阶段，在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处于缓慢起步阶段。但入宋以

^① “早期工业化”这一概念最初是由迪安提出的，用以称呼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工业发展。参见卡洛·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第134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② 吴晓亮：《宋代城市化问题研究》，载《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后,早期城市化确实进入一个跃升期,由起步阶段过渡到发展阶段,至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顶峰。在这一过程中,江南地区无疑是最为典型的,不仅因为隋唐以后江南逐渐成为全国城市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更重要的是,从宋代到明清,江南地区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形态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传统郡县城市突破了原来政治、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显著加强,社会影响力趋于广泛;另一方面,大批市镇在农村广泛兴起,打破了郡县城市一统天下的发展格局,不仅形成了颇为完整的区域性城镇体系,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文明向农村腹地的渗透和扩散。就此而言,古代江南不仅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我国早期城市化的基本特点。

二、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与城市化

城市化是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因此,分析江南地区的早期城市化,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看待该地区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点的问题。

在历史上,城市在江南地区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从春秋后期起,随着吴、越两国的相继崛起和社会开发的展开,各种城邑和城堡大量涌现,部分城堡和城邑逐渐向城市形态演进,吴国都城姑苏和越国都城会稽便是其中两个典型代表。不过,此期的江南城市仍带有不少原始城堡的特征,不妨称之为“城堡式”城市。以姑苏为例:全城分为小城、大城、外郭三重,其中小城周围 12 里,是政治中心和统治者聚居区;大城周围 47 里,是一般城区,包括手工业区、商业区、居民区等不同功能的社区,还有负责社会治安和市场管理的“市吏”,^①集中体现了姑苏由城堡向城市转变的特点;外郭周围达 68 里,为附属乡村,与西周初吴太伯始筑姑苏城时,“外郭三百余里”,“人民皆耕田其中”的情况相似,^②从中反映出原始城堡形态的遗存。显然,城堡式城市实际上是由城堡到城市的过渡形式,尽管其城市形态尚不成熟,却标志着社会体系中城市现象的出现。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不仅为随后郡县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意味着江南早期城市化的萌芽。

秦统一全国后,全面推行郡县制,郡县城市成为江南城市发展的主要形

① 《越绝书》卷 2《记吴地传》,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吴越春秋》卷 3《王僚使公子光传》,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吴越春秋》卷 1《吴太伯传》。

式。但在秦汉大部分时间里,江南地区远离统治中心,社会开发相对低落,城市发展也十分缓慢,一些地区甚至长期处于“得其地,不可郡县”的原始落后状态。^① 这种状况从东汉中期起,特别是在六朝时期,才发生显著变化。伴随大规模的政治地理开拓,社会经济的持续开发,城市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经济日显活跃,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到南朝刘宋中期,在今常州以南太湖流域和浙江地区,已有 65 个郡县城市,^② 初步形成了区域性城市分布网络。其中,作为六朝都城的建康,居民一度多达 28 万余户,^③ “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④ 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繁华都市。一般性郡县城市的发展也引人注目,如会稽、晋陵、宣城、毗陵、东阳、吴郡、永嘉等郡城和乌程、钱唐、鄞、章安等县城,都是当时较为活跃的城市。会稽郡城山阴商贾云集,百物汇聚,部分巨商豪贾凭借雄厚财力,欺行霸市,致使“店肆错乱”,“商估没漏”;^⑤ 始建于东晋初的永嘉郡城永安,到南朝前期已是“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⑥ 在此基础上,到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尤其是太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了以杭州、苏州等具有跨区域影响的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带,与中原黄河中游城市群带成南北呼应之势。

不过,汉唐时期的郡县城市就性质而言是政治性的,主要承担各级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的职能,经济和社会活动都是附属的。每个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固然要受到所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从根本上讲,统治者设立城市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各地的控制。因此,不同的政治地位,往往决定了城市的内在结构、空间规模和辐射范围。政治地位越高,城市规模就越大,通过层层相属的行政体系而控制的空间范围也越广。在城市等级体系中,郡级城市之所以高于县级城市,表现出更大的发展活力和影响,不是因为前者是更高一级的经济和社会中心,而是后者在政治上隶属于前者。就此而言,此期江南地区郡县城市的发展,除政治方面外,其意义主要在于使城市现象由个别走向普遍,由零散走向系统,而不是推动社会的变革与飞跃。与此相对应,城市化也一直处于起步阶段。

宋代是古代江南城市发展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基于汉唐以来的长

① 《汉书》卷 64《严助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② 《宋书》卷 35《州郡志一》,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90《江南东道二·昇州》引《金陵记》,中华书局影印本。

④ 《隋书》卷 31《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⑤ 《全晋文》卷 21,王彪之《整市教》。

⑥ 《嘉靖温州府志》卷 1《城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期开发,江南社会发生质的飞跃,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区域。这当中,城市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不仅在整体水平上全面确立起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而且集中体现了此期城市发展形态的重大变革。特别是到南宋时期,江南城市普遍突破了原有政治、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经济和社会功能显著增强。其中,就经济方面而言,主要表现为:第一,工商活动冲破传统坊市制下政府的严格控制和空间局限,由封闭的商业区扩散到城市各个角落,进而越出城墙,向城郊扩展。如临安城内,“自大街及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①城郊东南3里、南5里、西南10里、西25里、北9里范围内,也是“商贾骈集,物货辐萃”,^②与城中无异。第二,市场发达,商品流通活跃。许多城市市场繁多,分工精细,既有综合市场,又有专业市场;既有零售市场,又有批发市场,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的市场结构体系,而且市场活动不再只是满足城市自身的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地区内部和跨地区商品流通的职能。第三,产业形式多样化,经济结构趋于完整。除了一般工商业外,服务业、文化业、娱乐业、旅游业、城郊经济作物种植业等也相当活跃,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临安、苏州等大中城市,已基本完成从消费性商业为主体的单一经济向集生产、消费、流通于一体的多层次产业体系的转变。就社会领域而言,其突出表现首先是市民阶层的兴起。随着工商业的繁荣,除了政府部门及相关领域的人员和士人外,以工商业者及相关行业人员为主体,包括雇佣人员、伎艺人员、无业游民等在内的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不断壮大,在城市人口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据有的学者估计,到南宋中后期,临安城内仅从事工商业和服务业的人口就高达20万人左右。^③这不仅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社会结构,而且引发城市文化、社会风气、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市民文化的兴盛,有力地推动了世俗文化的发展,促进传统文化走上大众化和平民化的道路。其次是市政管理日趋系统、成熟。由于工商活动和人口的大量聚集,使得原有城墙范围内的城区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突破空间限制,扩散到周边乡村,导致城乡空间界限趋于模糊;同时,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变革,也使得传统坊市制下政治区、居民区、商业区条块分割的城区格局和单一管理体制难以维持,导致城市管理体制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城、郊一体,坊、市结合,分级管理的行政体制,以及消防、卫生、环境保护、赈济、

① 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②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21《桥道》,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③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第190页,西泠印社1986年版。

慈善等适应城市社会和生活需要的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制度。

由此可见,宋代江南城市的兴盛,并不只是汉唐以来城市发展的简单延续,而是从城市个体形态到区域结构体系的重大飞跃。就前者而言,各级城市在继续充当不同等级政治中心的同时,开始向不同层次的、开放性的经济中心和社会中心转变,其影响也由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就后者而言,由原来在政治因素主导下的县、州两级等级体系,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和社会因素为主,包括综合型、经济型、交通型、港口型等不同类型,基层城市、地区中心城市、跨地区中心城市、全区域中心城市等不同层次的结构体系。这些都表明,城市开始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动力。它与同期市镇在农村的广泛兴起互相呼应,共同推动江南早期城市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宋代以后,江南城市的发展遇到越来越多的阻碍。到明清时期,尽管江南城市总体上继续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不少城市呈现出空前的繁华,但就其实质而言,只是宋代变革基础上的历史延续。事实上,随着明、清两代统治的日趋没落和僵化,对城市的政治控制和经济盘剥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明政府陆续采取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强化城市户籍管理、控制工商行会、加重工商税收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各方面压制了城市的发展活力,导致城市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明后期江南各地此起彼伏的市民反抗斗争,便是这方面的反映。与此同时,封建城市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进一步暴露。官僚贵族、地主豪绅等特权阶层麋集城市,他们的消费需求常常成为城市工商业兴盛的直接动力之一,造成不同程度上的畸形和虚假繁荣。正如明神宗时大臣李熙在奏疏中所指出的:“今之末称可谓繁夥矣。磨金刮玉多于耒耜之夫,藻绘涂饰多于负贩之役,绣文纠采多于机织之妇。举凡可以耀耳目、淫心志者,罔所不施其巧。”^① 这些内外因素的制约,表明封建城市因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身固有的局限,已没有进一步跃升的空间,“量”的发展并没有引发“质”的进一步飞跃。在区域城市化进程中,也逐渐丧失了“主发动机”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这正为市镇在城市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① 《明神宗实录》卷4,隆庆六年八月。

三、古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城市化

农村城市化是以农村为中心的社会变革现象,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农村城市化是近代以来城市化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农村工业化浪潮,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镇建置的放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地域的城镇职能越来越强化,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趋同于城市”,农村城市化才开始起步。^① 确实,农村城市化就发展方向而言是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是城市社会在农村地区的简单复制和模仿,也不是城市取代乡村导致城乡差异的消失,而是农村社会基于自身特点形成与城市文明本质上相似、水平上接近的发展形态,是城乡之间在彼此融合的基础上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城乡社会结合体的小城镇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城市文明向乡村扩散和渗透的结果,更是农村社会基于自身的变革需求,在人口、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形成城市特征的表现。可以说,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的一个标志。

在中国历史上,小城镇主要是以农村市镇的形式出现的。尽管与现代城镇相比,古代市镇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如同古代城市的不成熟性一样,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其所具有的城镇特性,也不能因此否认市镇发展所引发的农村城市化现象的存在。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从宋代开始,市镇不仅广泛兴起于农村各地,而且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对农村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纵观宋代以后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可以明显看出两个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一个是前文已经谈到的围绕州县城市展开的一般城市化;另一个就是围绕市镇展开的农村城市化。

江南地区的早期市镇,包括镇市和草市两种形式。前者部分是由原来作为各地基层军事据点的镇戍嬗变而来,部分是通过县城降格、集市升格、税务坊场改置、交通驿站升置等方式设置的,规模相对较大;后者主要是在临时性乡村墟市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规模大多有限。到北宋中期,市镇已兴起于江南各地,作为不同规模农村居民商业聚集地的意义也基本确立。据估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前后,江南所处的两浙路(其范围包括今

^① 张小林、金其铭:《乡村城市化理论研究》,载《中国城镇发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

江苏南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市镇总数已超过 400 处;^①另据熙宁十年(1077 年)宋政府的统计,两浙路中仅润、常、苏、秀、湖、杭 5 州,市镇的年商税额合计就有 10 万余贯,占 5 州商税总额的 19.8%。其中,秀州和杭州的市镇商税额在本州商税额中所占的比重更高,达到 30% 左右。^②表明市镇工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江南市镇在北宋时期总体尚处于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一方面,数量大幅度增加,逐渐形成颇为密集的空间分布网络。仍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 700 处,其中镇市 100 多处。^③另一方面,市镇的工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年商税额超过万贯的市镇,北宋时只是个别现象,到南宋中后期已相当常见,部分市镇更是高达数万贯,乃至数十万贯。在不少地区,市镇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镇江府江口镇的年商税额,南宋中期已有 13 万余贯,后来增至 48 万贯,远远超过了府城。^④咸淳(1265—1274 年)初,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 4 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 26.4 万余贯,占了府级商税总额的近 2/3,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 1.7 倍。^⑤与此同时,除部分草市尚未完全摆脱乡村墟市状态外,大部分市镇在发展形态上开始形成不同的特点,其中大致可分为六类:一是环城市镇,主要分布于州县城市的周边地区,特别是部分繁华都市的城郊地带。其特点是经济结构相对完整,商业、服务业和手工业都比较发达,市场兴旺,商品流通活跃。如江阴城外的江下市,一度成为太湖流域北部著名的海外贸易集散中心,“商船倭舶岁常辐辏,狙佺翕集”。^⑥二是农业市镇,主要分布于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具体又表现为粮食市镇、林业市镇、果品市镇等不同形式。这些市镇以所在地区的农副产业为基础,承担着相关产品外销和流通的职能。三是手工业市镇,散布于各地农村,一般以一种或几种手工行业为主体,具有专业化生产的特点。如在沿海地带,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盐业市镇;在桑蚕业发达区,形成了不少丝织业市镇。此外,还有陶瓷业市镇、造纸业市镇、制药业市镇、编织业市镇等。四是商品转运市镇,主要分布于水陆交通沿线,以

① 这里所说的两浙路市镇数量,是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估算出来的。参见拙著:《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第 7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宋会要辑稿》食货,16 之 7 至 9,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 参见拙著:《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第 79~82 页,表 2-6。

④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 6《财赋》引《咸淳志》,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 59《贡赋·商税》。

⑥ 朱昱:《重修毗陵志》卷 2《地理志·坊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